

康有為傳

湯志鈞 著

康有為是中國近代史上重要而有深遠影響的人物。早年學習西方，想望改革清廷，組織學會，創辦報刊，領導維新，推動戊戌變法。後又組織保皇會，本書根據檔案、手稿，綜述康有為由治學到從政、由亡命到歸國、由言論到隱居的一生，並具體分析其思想而予以適當的評價。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湯志鈞 著

康有為傳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康有爲傳 / 湯志鈞著. -- 初版. -- 臺北市
：臺灣商務，1997[民86]
面：公分

ISBN 957-05-1427-2 (平裝)

1. 康有爲 - 傳記

782.884

86013975

康有爲傳

定價新臺幣四八〇元

著者 湯志鈞

責任編輯 陳淑芬

封面設計 吳郁婷

校對者 陳寶鳳 呂佳真

發行人 郝明義

出版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〇二)三一六一八

傳真：(〇二)三七一〇二七四

郵政劃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出版事業：局版北市業字第九九三號

登記證

•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 一九九八年十月初版第二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代序

——關於康有為的歷史評價問題^①

康有為是近代中國起過重要作用和深遠影響的人物，而對他的評價卻存分歧。

康有為領導十九世紀末葉的維新運動，是「先進的中國人」，這點無容置疑。問題是，他在政變以後組織保皇會，展開「勤王」活動，以及他著有《大同書》，又倒填年月，他的高遠理想和政治實踐又該如何評價？本文準備就上述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偏高和偏低

過去，很多論著以為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領導者，但後來成為「復辟的魁首」，「前半生進步，後半生反動」；即使是維新運動時期，在汲取外來文化和對待傳統儒學上，在政治改革的組織和言論中，都存有局限。

近年來，又出現了對康有為評價過高的現象，有人認為「他的愛國思想是一以貫之」的；甚至認為他在辛亥後刊行《不忍》，倡立孔教會，鼓吹「虛君共和」，都是為了「反對袁世凱的假

共和」。

如果說：過去對康有為的歷史評價「偏低」，那麼，近年來有些人又對康有為的評價「偏高」了。

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失敗後，確曾「勤王保皇」；民國成立後，他仍戀棧舊制，眷念清室；一九一七年，還參與擁戴溥儀復辟，但是否「前半生進步，後半生反動」？他的「進步」與否又以政變發生作為「劃線點」呢？不能。因為一個人由「進步」到「反動」，或由「落後」到「進步」，總得有個過程，總得有個思想基礎，不能說是今天「進步」，明天就「反動」了。這點準備放到最後一部分來評述。這裏，姑就近來的評價「偏高」，提出一些看法。

康有為的思想是「一以貫之」嗎？他在辛亥後的刊行《不忍》，倡立孔教會，鼓吹「虛君共和」，又是為了「反對袁世凱的假共和」嗎？不是。

康有為有沒有愛國思想？有。他生在遭受西方資本主義侵略和接觸西方資本主義最早的地區，面臨外國侵略、民族危亡，在中法戰後上書變法，甲午戰後組織學會、創辦報刊，領導了十九世紀末葉的維新運動；他學習西方，救亡圖存，確實是「先進的中國人」，是愛國者，即使在政變以後，當革命高潮未曾掀起以前，在一些人對光緒還有幻想的情況之下，他想扶植光緒重新上臺，反對慈禧為首的腐朽清政府，也還可說是愛國的。但是否「一以貫之」？卻不能這樣說。愛國，要看他在什麼歷史條件下，在什麼時代背景中，愛什麼樣的國，而不是簡單地、抽象地不問時間、條件地認為他過去愛國，而抹殺了他後來的政治實踐，說是「一以貫之」。

應該承認，康有為確曾愛國，他還領導了一場愛國救亡的維新運動，但說他是愛國主義者，不等於把他一生的活動都用愛國主義來衡量，更不能為了說他愛國而對他的歷史倒退思想曲予掩飾。我們可以對康有為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獻身精神和變法活動以高度評價，卻不能對他後來的抵制正在興起的民主革命和民主潮流視而不見。近代中國的歷史是急遽向前、迅猛發展的，適應時代潮流，並引導社會前進，當然是進步的、愛國的；不能適應時代潮流，並且逆時代而動，那就至少是時代的落伍者，難以再稱是「愛國」了。

且從一九〇五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全國革命形勢進一步成熟的情況以後來看康有為的政治活動吧！這時，清政府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宣布「預備立憲」，正在歐洲漫遊的康有為聞之「大喜過望」，定一九〇七年改保皇會為帝國憲政會，並布告各埠會員，說明「適當明詔，舉行憲政，國民宜預備講求，故今改保皇會名為國民憲政會，亦稱為國民憲政黨，以講求憲法，更求進步」。企圖重溫立憲的迷夢。一九〇八年，清政府頒布「憲法大綱」，旨在保存封建專制制度，康有為又用帝國憲政會名義草書請開國會，要求「立下明詔，定以宣統三年開國會」。一九一〇年底，擬改帝國憲政會為帝國統一黨，向清民政部註冊，說是「不日會而曰黨，乃合全國人士與蒙古藩王共之」，故「益光明廣大之」②。可知康有為在革命高潮掀起、清政府搖搖欲墜的情況下，他維護的是瀕於崩潰的清朝腐朽統治，抵制的卻是民主革命和民主潮流。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康有為已無皇可保了，又提出「虛君共和」的口號，說是「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立憲國之立君主，實為奇妙之暗共和國」，而「滿族亦祖黃帝」，還

需清朝復辟。此後，更參與了溥儀復辟。那麼，康有為的思想不是隨時代而進的，而是逆時代而動的，不是順應社會歷史的發展的，而是違反社會歷史的發展，怎能說他的愛國思想是「一以貫之」？

或者說，康有為的保皇是「忠君愛國」，可說是「舊式的褊狹的愛國主義」。姑無論康有為政變前的維新思想與「忠君愛國」聯在一起，也無論政變初起，保皇會初設與「忠君愛國」聯在一起，而今天的「預備立憲」，已是清政府抵制革命的騙局，康有為仍舊愛這個「國」。不久，光緒皇帝「龍馭上賓」了，康有為還是愛這個「國」。君已無存，「國」又何有？「忠君愛國」，又怎是「一以貫之」？

如果說，康有為只是眷戀光緒皇帝的私恩，或可說是有其「舊式的褊狹的愛國」一面，問題是，他不只是一般「忠君」，而是組黨結社，反對正在掀起的革命運動，他在《布告百七十餘埠會衆丁未新年元旦舉大慶典告歲，保皇會改為國民憲政會文》就早宣布：「僕審內外，度形勢，以為中國只可君主立憲，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則內訌分爭，而促外之瓜分矣。」在《章程》第二條中宣示：「本會名為憲政，以君主立憲為宗旨，鑒於法國革命之亂，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憲萬不能行於中國，故我會仍堅守戊戌舊說，並以君民共治、滿漢不分為主義。凡本會會衆，當恪守宗旨，不得誤為革命邪說所惑，致召內亂而啟瓜分。」第三條申明：「本會以尊帝室為旨。」那麼，他「仍堅守戊戌舊說」，形勢變了，立場沒有變。他號召會員「不得誤為革命邪說所惑」，不是他一個人「尊帝室」，而是號召所有帝國憲政會成員跟著他「尊帝室」。

他不只是「忠君」、「尊帝」，而是把鬥爭矛頭指向革命派了。他仍主「君民共治、滿漢不分」，但此後的皇族內閣，卻證明了滿洲貴族對漢人自有界限，沒有「滿漢不分」。

當然，「忠君」是和革命相對立的，「忠君」勢將維護清室，革命就要推翻清朝。清室面臨崩潰，倒行逆施，康有為卻愈益靠攏，一會兒請開國會，一會兒與國內的國會請願團聯繫頻繁。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康有為對新建立的共和政府極為不滿，想用「前朝之法」代替革命秩序。

那麼，康有為在民國建立以後，刊行《不忍》，反對共和，是否為了「反對袁世凱的假共和」呢？也不是。首先，《不忍》刊於一九一三年二月，在此以前，康有為已經反對共和了。當辛亥革命爆發之初，他就以為「革黨必無成，中國必亡」^③。宣稱「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的《共和政體論》、《救亡論》、《中華救國論》也都寫於一九一三年《不忍》刊布以前，他早已反對共和了。其次，康有為刊行《不忍》，不是「反對袁世凱的假共和」，只要看，他在《不忍雜誌序》所說：「睹民生之多艱，吾不能忍也；哀國土之淪喪，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墮落，吾不能忍也；嗟紀綱之亡絕，吾不能忍也；視政治之窳敗，吾不能忍也；傷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見法律之蹂躪，吾不能忍也；懼國命之分亡，吾不能忍也。」他「不忍」的是舊的清封建專制政體的覆亡，「不忍」的是「國粹」、「國命」、「紀綱」、「教化」的「淪喪」，「不忍」的是社會歷史的向前發展，而不是為了「反對袁世凱的假共和」。也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導致了他在一九一七年的參與溥儀復辟。

照此說來，康有為由擁護光緒到擁護清室，由反對共和而復辟帝制，他所提出的「虛君共和」，不是「為了反對袁世凱的假共和」。儘管他過去是愛國的，但說他愛國思想「一以貫之」，無疑是評價過高了，不符實際。

理想和實踐

《大同書》是康有為「欲致大同之治、太平之世」的理想之作。他構思較早，成書卻遲，他又倒填年月，從而對《大同書》的評價也不一致。

我以為不能把康有為的理想和他的社會實踐割裂開來，不能把他早期的「大同境界」和《大同書》混同評價。康有為「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而「憂國憂民」，「悲哀振救之」，較早孕有「大同思想」，從他留存下來的《康子內外篇》和《實理公法全書》中可以看出，他曾「參中西之新理」，擬出「平等公同」的圖象。認為人生來平等，應有自主之權，然而當前「人不盡有自主之權」④，如「君主威權無限」⑤等，就是現實生活中不合「公理」的。他憂患人生，想望平等，想望有一個「大同境界」。通過一八八八年《上清帝第一書》的政治實踐，他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從而再從儒家今文學說中汲取力量，推演「三統」，比迹「三世」；又以《公羊》三世學說和《禮運》「大同」、「小康」學說相揉，在戊戌變法以前基本上構成一個「三世」系統，即以《公羊》的「升平世」說成是《禮運》的「小康」，《公羊》的

「太平世」，說成是《禮運》的「大同」。

結合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康有為以中國封建社會為「小康」，即「升平世」；認為實現君主立憲的資本主義，才能「漸入大同之域」。

戊戌政變前，康有為不斷上書光緒皇帝，希望中國有一個不要根本改變封建制度而可以發展資本主義的憲法；要求保護民族工商業，予資本主義以適當的發展，並構成一個「三世」系統，希望由「小康」進至「大同」。他的學術思想是緊密地為其政治目的服務的。

然而，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孕育雖早，而《大同書》的撰述卻遲。雖然他自稱一八八四年就撰有是書，實際是倒填年月，我在五十年代就撰文說明《大同書》是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所撰。後來看到《大同書》手稿，更可確證他不可能在一八八四年撰有是書。梁啟超所說撰於「辛丑、壬寅」間是可信的^⑥，這裏就不贅述了。

《大同書》既是康有為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的撰著，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大同三世」說，也和先前不同了。他說，孔子之時，「身行乎據亂」，是「亂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於隋、唐」，應該進化到「升平世」（「小康」）了；隋、唐以後，至今千載；中國應該「可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秦漢的崇「刑名法術」，王莽、劉歆的「創造偽經」，晉代以後的「偽古學大行」，以致「微言散絕」，「三世之說，不誦於人間，太平之種，永絕於中國」，而二千年的中國，只是「守據亂之法以治天下」。那麼，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不過是「亂世」，並非「小康」，與戊戌前的「三世」說不同了。

他說：「孔子生當據亂之世。今者，大地既通，歐、美大變，蓋進至升平之世矣。」^⑦以為歐、美已經「大變」，進至「升平世」了。具體說來，英、德、日本是「民權共政之體」，是「升平」^⑧，而美國、瑞士則「進於大同之世」。中國則二千年來乃是「據亂」，與歐、美的「升平」不同。他說：「今當升平之時，應發自主自立之義，公議立憲之事，若不改法則大亂生。」^⑨即指當時世界潮流已當「升平」，應該「公議立憲」、「自主自立」，「若不改法，則大亂生」。可知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間，他仍堅主君主立憲，所謂「其志雖在大同，而其實在小康」。

《大同書》以中國封建社會為「亂世」，以君主立憲的資本主義制度為「升平」，它所說的「大同」又是怎樣的社會呢？《大同書》乙部《去國界合大地》中提到「太平世」（大同）的社會組織形式，是全世界設立一個統一的整體，最高的中央統治機構叫做「公政府」，「公政府」沒有「帝王、總統位號，只有議長」，公政府的行政官員由上下議員公舉，「上議員以每界每度舉之，下議員以人民多寡出之」。這些議員是世界「人民」的代表，而原來的各國則改為「自立州郡，設立小政府，全地統轄於全地公政府」，這就是「無邦國，無帝王」的「大同成就」的「太平世」的社會組織形式。

這種組織形式，如果就當時世界各國的情況來說，康有為以為「略近美國、瑞士聯邦之制」。就是說，各國皆歸併公政府裁去國字，建立類似美國、瑞士式的聯邦政府，在公政府的統一轄治下，「無國界，裁判法律皆同」，「大地人民所在之地權利同一」，這樣便是「無國而為

世界」了。也就是說，他所說的「大同」，是指略如美國、瑞士式的資本主義民主共和制度，他是以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為藍本，再加上一層幻想的塗飾，和他過去的「大同」涵義大相逕庭。

康有為「大同三世」說的演變，是和他政變出亡、遊歷歐、美有關的。過去他學習西方，但沒有到過西方，如今親眼看到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並不完全和自己想像的那麼完善，「人世界觀衆苦」的結果，發覺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苦境」，例如「工業之爭，近年尤劇」，「機器既創，盡奪小工」，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再加「近年工人聯黨之爭，挾制業主，騰躍於歐、美，今不過萌芽耳。又工黨之結聯，後此必愈甚，恐或釀鐵血之禍，其爭不在強弱之間，而在貧富之群矣」。這使較有政治敏感性的康有為不能不為之震懾，既要求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而「近年工人聯黨之爭」又使他震懾；既想望有一個「大同世界」，而遊歷歐、美仍然找不到一條通達大同之路，從而他的「大同三世」說逐漸改易。

就在康有為撰寫《大同書》之時，由於國內形勢的變化，他的弟子梁啟超、歐榘甲等也有些「搖於形勢」，康有為又寫了《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二文^⑩。前文對梁啟超等「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說」予以駁斥，主張「今令以舉國之力，日以擊榮祿請歸政為事，則既倒政府之後，皇上復辟，即定憲法，變新政而自強，是則與日本同軌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滿洲，是師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則其收效亦與印度同矣」。

後文以為「談革命者，開口攻滿洲，此為大怪不可能之事」，「吾四萬萬人之必有政權自

由，必不可待革命而得之，可斷言也。」「欲革命則革命耳，何必攻滿自生內亂乎？」

這兩封公開信，反對「革命者開口攻滿洲」，主張「皇上復辟，即定憲法，變新政而自強」。顯然是高唱復辟，反對革命的文字，它在當時流傳很廣，影響很大，章太炎就特地寫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大同書》撰述時康有為的政治實踐是堅主改良，《大同書》的理論實質也是如此。

康有為對通過革命方式走向資本主義是怕懼和反對的，而對通過政治改革方式逐漸轉變為資本主義則是贊同和宣揚的。《大同書》對法國革命，「路易殺身」，感到震恐；對於日本明治維新後的「驟強」則示欽羨。以為革命則「大亂」生，以喻革命不適於中國「國情」，「中國之俗，階級盡掃」，想用改良方法以消除「鐵血之禍」。他反對革命的飛躍，而主張循序漸進，「據亂」之後，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後，進以大同。當時的中國，既然還沒有脫離「據亂」，如仍「據亂」則「大亂生」，而欲驟期至美國、瑞士之界，固萬無可得之勢」。以喻中國當時還沒有可以到達「大同」的條件，只可實現「小康」（「升平世」），只可採取由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實行君主立憲；只可「由小康而大同，由君主而至民主」，「萬無一躍超飛之理」，否則「時未至而亂反甚」，「躐等」、「跳渡」是不行的。

他一方面以為實現「小康」以後，可循序而至「大同」，說：「若立憲，君主既已無權，亦與民主等耳！他日君銜亦徐徐盡廢，而歸於大同耳！」另一方面，又將「大同」描繪為遙不可期，說什麼：「合同而化，其在千年乎？其在千年乎？」「方今列強並爭，必千數百年後乃漸入

大同之域。」那麼，「大同」的實現，尚需在千數百年後，以暗示中國只能君主立憲，只可循序漸進，這就在理論上否定民主革命。

因此，《大同書》雖描繪出一個「大同」圖景，但其現實目的，卻是宣傳中國只可「小康」——君主立憲。這樣，評價《大同書》就不能不考慮他當時的實踐。

當然，《大同書》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抨擊，對帝國主義殖民壓迫的不滿等等，有其值得注意的地方。但在評述他高遠的理想的時候，也必須診視他當時的社會實踐。

至於有人為了證明康有為辛亥後反對共和，是為了「反對袁世凱的假共和」，竟說他在一九一三年發表《大同書》，就是為「反袁」而發，更不值一駁。如上所述，《大同書》是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間所撰，而他返國則在一九一三年，返國後將它發表，這是很普通的，能說康有為在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間，就已預見袁世凱十幾年後會有「假共和」嗎？儘管康有為在一九一三年《覆總統電》中表示「無心預聞政治」，他也没有「北首燕路，上承明問」。但對袁世凱叫他「主持名教」，仍感「餘生難忘，扶持所至，託於銓鐸」。他還認為「尊聖衛道」，和袁世凱「同心」，而希望袁世凱能「援手」的。

因此，我以為不能把康有為的理想和社會實踐割裂開來，不能把他早期的「大同境界」和《大同書》混同評價，更不能因它在一九一三年發表而說是為了「反袁」；應該探源比勘，釐定時間，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進行全面的歷史的評價。

保皇和革命

戊戌政變後，康有為在海外組織保皇會，貶之者以保皇會為「反動組織」，褒之者說它「適應華僑覺悟水平」，「具有愛國的性質」，究竟應如何認識？

保皇會自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成立，直到辛亥革命發生，他們的活動仍未停止，持續十餘年，遍布百餘埠，儘管屢易會名，時改會章，但它保皇臣清的性質卻未稍變。然而，在這十餘年間，風雲激盪，時局演變，對保皇會的評價，就只能根據當時形勢的發展，按照不同時期具體分析，而不能概而論之。

我以為保皇會初期，擁護光緒，反對慈禧，企圖「自立勤王」，「輯睦邦交」，曾經起過影響，也能「適應華僑覺悟水平」。

保皇會在《會例》中說：「專以救皇上，以變法救中國救黃種為主」；「凡我四萬萬同胞，有忠君愛國救種之心者，皆為會中同志。」「準備在美洲、南洋、港澳、日本各埠設會，推舉總理。」並以澳門《知新報》、橫濱《清議報》為宣傳機關。會中捐款作宣傳、通訊、辦報之用，並擬集資作鐵路、開礦股份。說是「為救得皇上復位，會中帝黨諸臣，必將出力捐款之人，奏請照軍功例，破格優獎」；「凡救駕有功者，布衣可至將相」^①，循名責實，保皇會以保救光緒、「忠君愛國」為宗旨。

這時，贊助變法的光緒被幽禁，推動維新的志士被誅逐，而執政的則是慈禧、榮祿、剛毅等一夥頑固派，從國內到海外，對維新派的遭遇，光緒帝的禁厄，表示同情的大有人在。維新新政雖然只有一百零三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著進步意義。扶植光緒重新上臺，排阻腐朽頑固勢力，有這種想法的也不乏其人。康有為「蹈日本而哭廷，走英倫而號救」^⑫，為的是要救光緒，認為光緒復位，才能「救中國」；「救聖主」，也就是「救中國」。一八九九年印布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說：要保國保種非變法不可，要變法「非仁聖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愛國救種之心」的，都是會中同志。他把「忠君」和「救國」聯繫起來，把光緒和變法聯繫起來，「救聖主而救中國」^⑬。頗有一些號召力。這時，資產階級革命派雖已醞釀起義，但革命的聲勢還不大，輿論宣傳也遠不如保皇會。當一些人對光緒還存幻想的情況下，揭露清政積弱，控訴慈禧「訓政」，擁護改革變法的皇帝，反對頑固守舊的慈禧，是起過影響的。當改良和革命沒有明確分家以前，說保皇會已經是「反動組織」，那是不公允的，要把戊戌政變作為康有為進步與否的「劃線點」，也是不公允的。

正由於如此，保皇會曾得到加拿大、美國、澳洲、南洋各地華僑的贊助，如加拿大「烏威士晚士打之志士慕其忠義，皆歡迎之來，衆情歡合，乃三次迎請」^⑭。有的說：「如我聖主崛起而行新政，康先生佐之，斯誠救時之急急，莫急於此者也。」^⑮有的說：「此間人心日談維新之益，全不畏賊黨之謠言，真可恃也。」^⑯保皇會組織之初，是得到海外華僑的支持的。

沒有多久，國內發生了義和團運動，恰恰慈禧、榮祿利用過義和團，八國聯軍又乘機武裝干

涉，保皇會認為這是反擊后黨、「決救皇上」的大好時機，從而宣傳：「頃者拳匪作亂，殺害各國人民，因及公使，禍酷無道，聞之憤怒，令人髮指，此皆由西太后、端王、慶王、榮祿、剛毅通聯拳匪之所為也，其所以結通拳匪，出此下策者，為廢弑皇上，絕其根株起也。」^①「欲拳之平，非去主使拳匪、任用拳匪之人不可；主使任用拳匪之人為何，則那拉后、端王為首，而慶王、榮祿、剛毅、趙舒翹為其輔也。」^②主張「先訂和約以保南疆，次舉勁旅以討北賊」^③。說是光緒復位就能「輯睦邦交」，「中國可安，億兆可保」^④，醞釀「討賊勤王」。結果，實際活動的唐才常在漢口事泄被殺，演成自立軍悲劇。

自立軍起義，是保皇會成立後的一件大事，他的經費來源，就主要依靠新加坡愛國華僑丘菼園的資助。儘管自立軍宗旨混沌、主張模糊，儘管康有為、唐才常有不同點，也儘管康有為這時對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已有抵制，但這次起義的鬥爭鋒芒主要是針對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這時的革命派和改良派未明確劃分界限，因而對康有為的評價還無可厚非。

然而，自立軍失敗後，許多知識分子逐漸從改良的思想影響下解脫出來，感到「天下大勢之所趨，其必經過一躺之革命」^⑤，從而走向革命的道路，所謂：「士林中人，昔以革命為大逆不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知動念矣。」^⑥康有為卻在一九〇一年後，公開發表《政見書》，對門人施加壓力，宣布保皇宗旨「無論如何萬不變」，凡有「革命撲滿」者以「反叛論」，又修正「大同」三世說，在理論上申張立憲。它的鬥爭鋒芒漸由針對慈禧為首的清政府頑固派轉向革命派了，由保光緒皇帝轉為保清朝封建政府，康有為的思想也漸落後於形勢了。